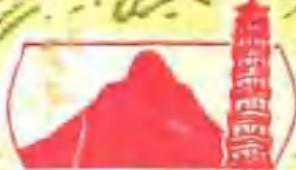


連縣文史資料

第四輯



4-6

連縣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

連縣文史資料

第四輯



連縣政協
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
1986.11.10



上为燕喜牌坊照片。牌坊中门顶上绘有原燕喜中小学校校徽。校徽为半圆三角形状，左侧边上部画有巾峰山轮廓，下部有通心美术字“燕喜”两字。校徽为书画家、原燕喜中小学校校长杨芝泉所设计。校徽右侧有一“燕”字，左侧有一“喜”字。牌坊右侧顶上有“莺飞”二字，左侧顶上有“鹏搏”二字。中门两侧有对联，上联是“吏部文章高北斗”（“吏部”指的是韩愈），下联是“连州水石冠南陬”（“陬”字读音如“周”，“南陬”是南方边地的意思）。上联旁边有如下小字：“明进士福宁游太初燕喜亭诗刻摩石上字小痕浅风雨剥蚀墨迹半湮今勒录于此”。下联旁边有如下小字：“中华民国廿九年元旦邑人杨芝泉书”。牌坊背面门顶上有“引人入胜”四个行书大字。中门两侧有楷书对联，上联是：“天泽涌泉流火与双清寻活水”，下联是“巾峰垂地脉境缘一览小群山”。
（何泳珠摄）

1982/06

翰愈被贬为阳山令时，曾夜宿龙宫滩并有诗（详见本刊第一辑封三）。此诗一年后呈政府授翰愈《思多诗》于此。

一九八五年

水多东泄，是
处飞湍鸣。惊
崖流之急。
若上子游银河，
此其行相
不相已自急，
亦东峻飞来
乎之意也。

光緒二十年岁
次甲午秋七月
督學使者仁和
徐某書。



目 录

参加同盟会、辛亥革命回忆片断	龙裔禧	(1)
对《龙裔桢在连州起义始末》的意见	杨芝泉	(14)
何克夫组织粤北民军经过及其他活动	冯义	(17)
何克夫轶事数则	何国工	(26)
先父刘秉祥生平事迹述略(附剪报)	刘甦	(31)
连县人民对孙中山先生的纪念	黄洪威	(36)
回忆青年学生集训队在星子	虞泽甫	(38)
燕喜书院的演变	杨芝泉	(41)
钦州师范迁连办学情况杂忆	陈康	(52)
钦州师范在连县	邵万学	(57)
解放前连县的几种租佃形式和租佃关系	邵万学	(59)
连县双溪亭、桥渡料史	邓国器	(61)
关于邵谏议的传说及其遗迹	邵万学	(64)
烈性传染病在连县流行的情况	韩舜年	(66)
关于孟宾于生平事迹的若干考证	黄志辉	(70)
孟宾于诗八首注释	黄志辉	(74)
孟宾于生平事迹考	关照禧	(85)
封二：原燕喜书院大门牌坊	何泳珠摄	
封三：《思乡亭》	何永壮摄	

参加同盟会、辛亥革命 回 忆 片 断

龙裔禧

(一) 我们叔侄留学日本的经过

一九〇二年，两广大学堂（后改为广东高等学堂）开办，原在时敏学堂读书的先三兄龙裔桢，即偕我及胞侄龙荣轩，前往投考。我和龙荣轩考取了，但龙裔桢在口试时，考试官曹汝英（广东人，北洋水师学堂毕业）看到他卷上有平等自由等新名词，即指着他骂道：“你去讲平等自由吧”，遂将试卷丢弃，不予录取。一九〇三年，龙裔桢考入广东武备学堂，约一学期后，因闹饭堂风潮，被指为革命党，与朱通儒、王统等四十余人，同被开除。

一九〇三年夏天，龙裔桢偕胞侄龙荣轩同往日本留学，路经香港时，与过去时敏学堂的同学黎孝渊（仲实），卢牟泰（可峰）、李自重等三人相遇。三人因在东京参加伐俄义勇队，被清政府向日本政府提名开除学籍，均劝龙裔桢不要去日本留学，而与他们一样各自回乡作内地运动（当时称革命活动为内地运动），先从开通民智，宣传革命入手。龙裔桢听从黎仲实等之言，遂于此时由黎仲实、史古愚（史坚如之兄）二人介绍加入同盟会（当时因同盟会尚未正式成立，故为掩护起见，表面上仅称青年会），而命我与龙荣轩二人

同往日本留学。当时我们叔侄二人系在广东高等学堂读书，因感该校注重读古书做经义策论，学不到什么新科学知识，故决意出洋留学。龙裔桢于送走我们二人赴日后，即回家乡连州开办小学，并办理阅书报社，宣传革命。

我与龙荣轩赴日留学，得香港史古愚介绍给在日本横滨的冯自由。故我们抵横滨后，即由冯自由予以接待，送我们到东京①先三兄龙裔桢时敏学堂同学区金钩处（区是时已是同盟会员），由区金钩招呼我们叔侄二人入东京成城学校读普通学。该校是专门招收中国留学生的，当时只有四个班，我和龙荣轩读第四班。我记得吴玉章同志也在该校读书，他读第一班。平时我和他接触较少，但早晨洗脸时却常常碰面。此外，我还认识别班同盟会员朱少穆、阮亦周、潘赞化、何天炯等人。

我在成城中学读了一年，即自行退学，自修英文和数理化约一年。一九〇五年我考入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先读预科，一年后转入特别本科（机械科），一直读至一九一一年始毕业回国。我的胞侄龙荣轩则在成城中学读了两年半毕业，以后被选入东京商船学校（即海军预备学校）。

（二）参加同盟会的经过

我自一九〇三年夏天初到日本东京时，曾与区金钩同住在御下宿涌泉馆（下宿即客栈之意，冠以御字系对旅客的敬语）。有一天晚上，孙中山先生到涌泉馆访区金钩，和区金钩两人在房间里密谈，我因住在对面房间，听不到他们谈的是什么。孙先生走后，区对我说：“先生（指孙中山）来访，系研究夺取琼崖做革命根据地的问题，并拟把此任务交给我

去执行，要我先作好准备，订出具体计划，以后进入琼崖时，先联络当地绿林头目，再举行武装起义。”他是南海盐步人，出身贫苦农民家庭，对革命意志十分坚定，所以孙中山颇信任他。这时我虽还未加入同盟会，但区敢对我说这些话，说明他已把我当自己人看待了。

同年十月间，我由区金钩和廖仲恺两人介绍加入同盟会，加盟地点是在东京神田区神保町三丁目廖仲恺寓所楼上。在一个晚上（具体日期已记不起）孙先生亲自为我主盟，在座的除孙先生和我外，还有廖仲恺、胡汉民、汪精卫及区金钩等四人。我当时只有十七岁，虽然孙先生和蔼可亲，但内心却很紧张。区金钩似乎看出我的心情，便坐在我的背后，准备帮我回答孙先生的话。孙先生与廖仲恺研究一个英文名词的意义后，即命我举起右手宣誓，誓词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有始有终，如或渝此，任从处罚”等语。我宣誓毕，孙先生教我以同党互相握手的方法（即手指互握法），然后进入谈话。孙先生问我有兄弟几人？我答有兄弟四人，大兄龙裔元在广雅书院毕业，现在家乡办实业；二兄龙裔亨是康有为门生，现任连县高等小学校校长；三兄龙裔桢在时敏学堂读书时，与黎仲实及介绍我入盟的区君等同学，他在香港时已由黎仲实、史古愚二人介绍加入青年会（同盟会正式成立前的名称），已由香港回连州作内地运动了。我在兄弟中居第四，年龄最小。孙先生笑着问我：“你二兄既是康有为的门生，那你是否保皇党吗？”我答我二兄龙裔亨虽为康有为的门生，平时也颇喜欢读康有为著的《大同书》一书，但他仍是倾向革命的。孙先生再问我：“让你担任运动连阳绿林起义工作，你意如何？”区金钩坐在背后说：“他的三兄龙裔桢曾考入广东武

备学堂，因讲革命被开除。龙裔桢体格甚好，又懂军事，且在香港已加入同盟会，并已回家乡做内地运动，何不将此工作交由他去担任？”孙先生颇以为然，于是对我说：“你就在此一面求学，一面做你三兄的联络员吧。”加盟仪式至此结束。

孙先生初到东京时，系住在东京小石川区的下宿屋内，房间甚小，故加盟仪式多在日本友人金弥先生家里或在牛道区廖仲恺的寓所举行。在牛道区廖寓第一批加入同盟会的有黎仲实、区金钩、何香凝、廖仲恺、马君武、朱少穆、冯自由、胡毅生等人。（后廖寓由牛道区迁至神田区神保町三丁目，孙先生始以廖寓为经常主持加盟和开会的秘密机关。）在廖寓第二批加盟的有当时的速成法政生胡汉民、汪精卫、朱执信、古应芬等人，均由胡毅生作介绍人。不久之后，我即由区金钩、廖仲恺两人介绍加盟（详情已见上述）。（我于一九〇三年在成城学校读书时①加入同盟会，时间并没记错，胡汉民亦系在一九〇三年第二批加入同盟会，何香凝在所写《辛亥革命回忆》一文内，亦有提及，而冯自由著《革命逸史》一书，竟有胡汉民系在一九〇五年始加入同盟会之说，致外间对我在一九〇三年间加入同盟会之事，颇有怀疑。据我推想，冯自由先生所述胡汉民加入同盟会时间，似系就法律上意义而言，其意是指胡汉民虽在一九〇三年已加入同盟会，但至一九〇五年同盟会正式成立时始得追认。）

孙先生对每个加盟的人，都根据其才能及特点，给予一定的革命任务，如办报刊杂志，搞宣传活动，或回国联络绿林、会党、军队、举行武装起义，等等。记得当时成城中学的同学中，参加同盟会的有阮亦周、朱少穆、何天炯、潘赞

化等人，他们每人都担负了一定的革命工作。阮亦周是广东香山县（后改为中山县）人，比我低一班。没多久，孙先生派他回广东搞革命活动，我问他担任什么任务。他说孙先生叫他在来往省港间的轮船上，扮作叫卖膏丹丸散的卖药人，从中向旅客宣传革命道理。辛亥革命广东光复后，选举省议会议员时，我曾听过他的竞选演说，其姿态、口音、动作等，还酷似一个卖药人，证明他从事过这项工作已久，并已养成了习惯，一时不易改变，亦可证明他始终听孙先生的话。后来听说人家说他有神经病，没有理他。朱少穆在加入同盟会时，孙先生曾询问他的志愿，朱答愿意在海军中搞革命，后来果被选入海军预备学校（即商船学校，因日本的海军预备学校不收中国留学生）。但他后来竟为了到横滨追求一华侨的女儿为妻，而向海军学校请求退学改习法政（因海军学校校规甚严平时不能请假），且抱着做官思想，孙先生闻之遂不予以信任。何天炯别字晓柳，广东兴宁人，在东京参加同盟会的会员名单，由孙先生交他保存，估计他可能搞组织工作的。潘赞化是山东省人。我在多年后的国民党政府中，见他担任过农业技士之类的工作。

孙先生于一九〇三年春，在东京筹备组织同盟会，约经一年，即于是年冬，经檀香山赴美洲宣传革命。约三四个个月后，即一九〇四年春，由美洲经日本赴欧洲考察，作环球旅行。经过日本时，曾在横滨山下町所设的秘密通讯联络处，住过一个时期。当时在东京陆军士官学校的中国留学生，很多到横滨谒见孙先生，故此时吸收了不少陆军留学生加入同盟会。

一九〇五年八月二十日，中国同盟会在东京召开成立大会，地点在东京赤坂区日本人金弥先生家中。会上推举孙先

生为同盟会总理，通过同盟会章程，采用了西方的三权分立制，设立了执行部、评议部和司法部三部。

在开大会的前一天，即有保皇党分子扬言要来捣乱，并宣称如查出官费生参加开会者，即报告留学生监督开除学籍，取消其官费。我适考入东京高等工业学校预科，补为官费生。同住者多为保皇党徒，且加盟时孙先生允许我继续求学，暂不回国搞革命活动，故我没参加同盟会的成立大会。事后由汪精卫通知我，同盟会成立时，推举了评议员六十名，我亦评议员之一。

一九〇五年大约是十二月间，同盟会在东京麻布区中山寓所召开过一次会议，我以同盟会评议员资格得被邀参加。事先我不知开会内容。当到达中山寓所玄关（即入门脱鞋处）时，即见胡汉民夫人陈淑子在脱鞋，她是一小脚者，穿的又是长统皮鞋，故动作较慢。我脱鞋后，比她先进入内，见各门扇都拆开，房间充作会场，场上已坐了三四十人。孙先生穿着和服，在右边踱来踱去，表情严肃沉重。汪精卫招呼我至左边签名桌上签到。他对我说：“今天开会是因为我们的同志陈天华在大森海滨蹈海自杀了。现拟筹些运费把他的棺柩运回原籍，请你亦捐多少吧！”我问应捐多少？他说“至少要捐四、五元，你系官费生，应多捐些。”我于是即签了六元。开会时由陈次龙任主席，详述陈天华自杀经过，继由胡汉民发表演说，大意是说：陈天华因反对日本政府取缔留学生，愤于清廷的腐败与外国的欺凌，不惜以牺牲生命来激励国人。我们革命党人要继承陈天华未竟之志，努力救国。胡讲话后，尚有数人相继发言，均是外省人，我不认识。开会时，孙先生进入另一房间，并未出来讲话，汪精卫亦没发言。

一九〇六年约七月间，章太炎自上海出狱后抵日本（章因“苏报案”和邹容同被清廷勾结上海租界帝国主义势力，逮捕监禁，邹死于狱中），同盟会组织留学生于东京神田区锦辉馆（一处商营出租会场）开大会欢迎，到会人数很多，整个会场都坐满了（估计有千余人）。章发表演说，操浙江话，好多人听不懂，初由胡汉民做翻译，胡译了几句，也译不下去，改由吴玉章翻译。章在谈话中一连串地说他有一种幼稚病（有人说章太炎先生说的是神经病而不是幼稚病。但当时我听他说的是幼稚病而不是神经病，自信并没听错。且在欢迎会上说自己过去从事革命活动没经验没预见而谦称是患有幼稚病亦属合理。所谓“革命的人须患神经病”一语似是章太炎先生到东京后主编《民报》时的言论，因为他在东京时对日常生活每每不拘小节，致笑话甚多，如某日浴罢竟赤裸裸地出而见客，人人都笑他有神经病。后他在某追悼会上所作挽联中有“革命家须病神经”一句，乃是有所感而发。断不致在欢迎会上出此不甚得体的言论），其他内容已记不起了。章到日本后即接手主编《民报》（同盟会机关报），进一步与保皇党的报刊《新民丛报》展开论战，章由此声名大著。

我自考入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后，与区金钩、肖友梅同住在麹町区九段坂上廖仲恺家里。廖为激励革命意志起见，把他的寓所取名为“励志学舍”。不久廖仲恺一家又搬至大久保居住，与钱树芬家眷属共租一屋，我与区金钩、肖友梅搬至大久保，另租一屋居住，取名“乐庐”，并邀刘叔和同住。一九〇七年三月初，清廷要求日本政府劝孙先生出境，孙先生离日赴南洋一带活动，胡汉民和汪精卫随行。胡、汪离开日本前，曾奉孙先生之命，到大久保访问廖仲恺和区金钩。

因廖寓来往人多，不便密谈，于是胡汪与廖仲恺同到我们住所——“乐庐”来商谈。胡、汪与廖仲恺谈的是关于廖今后的革命工作问题（具体内容不清楚），与区金钧谈的是关于孙先生拟派他夺取琼崖为革命根据地的准备计划问题。胡、汪对我兄龙裔桢担任运动连阳绿林起义的工作也有所询问，我把龙裔桢通信联系所知的情况作了汇报。是日胡、汪、廖三人在乐庐与我们共进午餐。饭后肖友梅与刘叔和表演洋琴与胡琴合奏。

这里顺便介绍一下孙先生与肖友梅的一段关系。肖与孙先生是同乡，又与黎仲实同是广州时敏学堂的同学，故黎介绍肖往见孙先生，意欲肖亦加入同盟会。但肖在见孙先生时，说他的志愿是专习音乐和研究哲学，此时不愿回国搞革命活动，请俟推翻满清后，再以其所学贡献给国家。孙先生亦颇嘉许之。后肖在日本音乐学校及东京帝国大学选科毕业，复往德国留学，专习哲学，回国后成为音乐专家，曾任上海国立音乐学院院长。中华民国的国歌即由他作曲。

自胡汉民、汪精卫来大久保后不久，我因感这里离我读书的学校（即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地址在浅草区藏前）太远（坐高架车亦需卅分钟），乃搬至浅草区学校附近的下宿屋居住（肖区刘三人亦迁居小石川区），此后与区金钧甚少见面，他何日回国赴琼崖，如何进行革命活动，我均不清楚。至辛亥革命广东光复后，我阅报始知他被广东都督胡汉民任命为琼崖民政长，不久因病辞职回省，任盐务署总务处长，后在任所病逝。

一九〇七年，孙先生离开日本后，和同盟会的主要骨干（如黄兴等）忙于组织武装起义工作，东京同盟会大有群龙无首之势，组织一片松懈。在东京的同盟会员，有的回国参加

武装起义或其他活动，有的留在日本求学，还有的回国应清朝的留学生考试（因为在清朝时代如不去应考留学生考试，则无法投身政界暗中进行革命活动）。我继续在东京高等工业学校读书。大约是一九〇七年秋天，夏重民（同盟会会员，我在广东高等学堂时的同学）来找我，要我协助他与黄增翥在东京办《大江报》。黄是该报的总编辑，我不认识他，一切由夏重民向我介绍。我的任务是翻译日本报纸上的一些电讯及国际新闻，有时也写一些论述，直接寄给黄增翥收，他也经常把《大江报》寄给我看。但不到一年的时间，这工作便停下来了，是由于该报被查封或有其他原因，现在已记不清了。廖仲恺则大约于一九〇九年回国，到吉林巡抚陈昭常处作幕僚，以此作为掩护，暗中进行革命活动。

在一九〇三年春起至一九〇七年孙先生离开日本时止，在日本一地，由孙先生亲自主盟吸收入同盟会的人数，根据抗日战争时期，我在重庆冯自由的寓所看过一份油印名单（该名单系孙先生交给何天炯即晓柳保存的），一共有九百名，全国除甘肃外（该省当时没留日学生），十七省都有盟员，名单上分各省排列，以直隶（即河北）排头，各省人数中，以广东省为最多，占一百名，以黎勇锡（黎仲实）列第一名，陈树人殿后（陈原在香港加盟，后始赴日留学的，故亦列入）。其他各省的具体人数，已记不起了。在我认识的盟友中，加盟时多用真名而不用别号，如黎仲实用黎勇锡、胡毅生用胡衍鸾，廖仲恺用廖恩煦，胡汉民用胡衍鸿，汪精卫用汪兆铭，朱执信用朱火符（在民报发表文章则用笔名蛰伸二字），高剑父用高嵩，等等。这些人的家庭出身，大体可分为三类，一是出身华侨资产阶级，如冯自由、廖仲恺等；一是出身地主官绅家庭或所谓书香门第，如胡汉民、朱执信

等，还有少数是贫苦农民家庭出身，如黎仲实、区金钧等。

(三) 龙裔桢在连州起义始末

一九一一年十一月十五日（即旧历辛亥年九月二十五日）我在东京高等工业学校毕业后回到上海。住了多日，在旅馆阅申报，见有“龙裔桢在连州起义自称都督，”电讯一则。数日后，申报复登载《连州光复情形记》新闻一段，内容大略称：革命党人龙裔桢于旧历九月二十四日凌晨，率武装部队百余人，并手提炸弹，向东门进攻。守城兵士见势不佳，无抵抗而开城门迎入。革命军队直抵州署，开枪数响，守兵无抵抗缴械投降。龙裔桢攻克州署后，首先擒获知州李保麟，命将印信交出，押到常平社学收容，将缴械剪辫诸事办毕，即出示安民，地方殊为安谧。

关于连州光复经过，我返粤后，先三兄龙裔桢与当时的连县民团长廖殿钦，对我叙述颇详，现记载于下：

龙裔桢于1903年夏天，在香港由黎仲实、史古愚介绍参加同盟会后，即回家乡连州开办小学，成立阅书报社，从事开通民智宣传革命工作。我到日本加入同盟会后，孙先生又委龙裔桢以联络连阳绿林会党准备武装起义之责，并以我作联络员。至1906年，龙裔桢拟在连州开办中学，因感学识不足，决意仍去日本留学。适当时我与胞侄龙荣轩在日本留学，均已补为官费生，先父尚可负担两人的留学费用。是年夏天，先三兄龙裔桢与先大兄龙裔元乃同往日本留学，龙裔桢进东京志成学校读普通学，龙裔元进弘文师范学校学工艺（如织布造纸和制樟脑等）。1907年夏，先父龙学乾因奉连州知州李保麟命，下省聘请中学教员，复办连州中学。在一个月内，聘得朱通儒、林正煊、朱兆奎三人为教员，雇专船

回连州。谁知船未到便为连州劝学所长莫子杰所反对，莫竟拒绝三教员上岸。先父因舟车劳碌，身体已不舒适，闻讯忧愤交集，遂致病逝舟中。龙裔元与龙裔桢在日本接先父逝世电报，即各结束学业，回国奔丧。龙裔元拟继承先父遗志，主持禁赌工作（因先父在生时，曾代表全州人民，下省请愿禁绝烟赌，虽由于全州人民的支持，获“胜诉”回邑，但亦不过禁止烟赌三年而已），故被连州赌商宋某等视为眼中钉。宋某竟下省贿通清吏，诬指龙裔元“通匪”（所谓“匪”指何克夫），将龙判罪监禁十五年并投入广州监狱。龙裔桢经此双重打击，对清廷的腐败，痛恨益深，因而对推翻满清的统治，蓄志益坚。因恐在连州复为官绅及奸人所陷害，遂下省进行革命活动，经常与黎仲实及我通讯联系，并在广才学校教书，以资掩护。

辛亥年三月二十九日之役，龙裔桢曾与黎仲实联络，预知其事，但他没有去香港同盟会统筹部报到（原因不清楚）。后广才学校校长任元熙（子贞）先生曾对我说，龙裔桢原住广才学校宿舍，但三月二十九日晚则宿于制台衙门对面华宁里某客栈内其时敏学校同学赵某处，翌晨始匆忙回到学校。同日两广总督张鸣岐出告示，中有凡遇无辫者格杀勿论之语（因参加举事者多为日本留学生）。龙裔桢回校后，不久即有警兵到校检查，以龙裔桢无辫，欲拘捕之，但他因没去香港同盟会统筹部报到，故同盟会叛徒莫辉熊写给李准的黑名单没他的名字，又得任校长的力保，始免于难。

三月二十九日之役虽失败了，但对龙裔桢的教育很大，他的革命精神益加振奋。他认为执行孙先生分派他在连阳运动绿林起义任务的时机已成熟了，遂于隔天（辛亥四月初一日）束装打陆路走回连州。路经阳山县，投宿客栈时，知县

闻其无辫，居为奇货，欲拘捕之，幸为友人罗某密告，乃夤夜逃走，始得脱险。

龙裔桢回到家里后，首先与三点会首袁开荣秘密联系，然后由袁开荣介绍，与邵村、元村、河村等处的绿林头目邵新贵、邵亚古、欧金生，及阳山县的李锦泉等进行联系，密商起义计划。袁开荣有一堂兄袁××因被州官诬指与某盗案有关，他坚不承认，被定罪永远监禁。龙裔桢乃通过他向狱中义士宣传革命道理，并把这些人暗中组织起来，准备于起义时由狱中冲出响应。至于乡中农民及中学青年学生方面，则由我的堂侄龙荣桂、龙荣达及梁绍敏三人负责宣传和联系，向他们宣传历年反清革命事迹（如温生财行刺孚琦、辛亥三月二十九日之役等等）。此外，还搜集有关革命书报如《扬州十日记》、《嘉定三屠记》、《革命军》、《警世钟》等书和载有秋瑾、徐锡麟等人革命事迹的报纸，置于图书馆内，供人阅读，向群众灌输革命思想。龙裔桢与叶其森、袁开荣三人，则频频与上述绿林头目，秘密接触，商议起义计划。

这样酝酿和准备了五个多月，武昌起义爆发，龙裔桢遂召集上述绿林头目和叶其森、袁开荣、龙荣桂、龙荣达、梁绍敏等于一个夜间在某地开秘密会议，决定组织连阳复汉义军，举旗响应。起义的武装队伍暂定一百二十五人，推举龙裔桢为都督，叶其森为总参谋，龙荣桂、龙荣达、梁绍敏三人为参谋，以邵新贵、邵亚古、欧金生、李锦泉和袁开荣等五人为分队长，各人分头组织农民二十五人，并各筹集枪枝子弹，作为攻城之用；如攻破州城，即收缴枪枝子弹，把起义队伍扩充一倍，即二百五十人，分为五个分队，以上述五头目担任各分队长。同时把我家作为临时指挥机关，准备起